

中国

哲学

青年学术文库

ZHONGGUO ZHEXUE QINGNIAN XUESHU WENKU

人民出版社

证人之境

李振纲 著

——刘宗周哲学的宗旨

本书得到河北省教委社科出版基金资助

ZHENGREN ZHIJING

中国哲学青年学术文库

ZHONGGUO ZHIXUE QINGNIAN XUESHU WENKU

证人之境

李振纲 著

——
刘宗周哲学的宗旨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张振明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赵迎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证人之境:刘宗周哲学的宗旨/李振纲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2

(中国哲学青年学术文库)

ISBN 7-01-003299-8

I. 证…

II. 李…

III. 刘宗周(1578—1645)—哲学思想—研究

IV. B248.99

证人之境——刘宗周哲学的宗旨

ZHENGREN ZHI JING——LIU

ZONGZHOU ZHEXUE DE ZONGZHI

李振纲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8.125

字数:189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01-003299-8/B·270 定价:15.00 元

序

张立文

李振纲教授好学深思，孜孜矻矻，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他在攻读博士的三年中，徜徉于中西哲学的宝库，神游于古今智慧的海洋，广收博采，进境日深，不仅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被《新华文摘》等所转载，而且完成了有创见的博士论文《证人之境——刘宗周哲学的宗旨》，获得各评审委员的一致赞扬。

戴山刘宗周为明末的硕儒。戴山之学，正如本书所揭，是以理气生生为形上本体，以心性圆融为内圣根据，以慎独诚意为证人工夫；并以此为进路，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而凸显戴山之学的逻辑结构或曰义理架构。哲学逻辑结构论，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一种解释或解读的方法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是指研究中国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及诸范畴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哲学范畴在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思维结构背景下所构筑的相对稳定的体系或结合方式。中国古代哲学家虽未必有外显的哲学专著文本，但有“一以贯之”的内在思维理路，并毫不例外地通过特定的哲学范畴及其互相关系而呈现出来，这样就形成该哲学家的哲学逻辑结构。理解和把握哲学家的哲学逻辑结构，就要契入该哲学家所面临的时代冲突，以及为化解时代冲突所做出的

回应和就其回应所运用的范畴。这就要求诠释者对其哲学的精神和其回应所致思的理路有准确而整体的体认,有广大而精微的领悟。李振纲教授以其扎实的中西哲学的功底,游刃于复杂而晦涩的戴山内在义理逻辑之间,揭出戴山哲学的心路历程、精神特质和逻辑结构的完整体系,而收独辟蹊径之妙。

戴山之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家一样,不太注重其哲学思维外在形式上的系统性、逻辑性,而与西方哲学家异趣;并乐于用格言、警句、答问和诗的语言来表达他对宇宙真际的了悟和人生境界的觉解。在这里,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交流的工具,而且是形成意义、决定思维和行为的主要因素。语言文字创造了思维空间和符号空间。一定时代的语言文字形式不仅表现一定的内涵和意义,而且决定由其建构的文本的内容。这就是说今人所能读到的文本,都是由一定语言文字决定的,而这个语言文字形式又与一定的思维空间、符号空间相联系。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仅读懂文本的字面意义,而且要追求对文本背后意义的理解和解读文本字里行间所隐蔽的意义。特别是一些思想家、哲学家在不正常的、即非常的境遇下所写的文本,往往不能直言,否则便有遭致杀身之祸的“文字狱”,而采取隐晦浑沌的表达方式,也给今人的解读制造了困难。凡此种种,只有全身心的投入其中,才能有真情的体悟。李振纲教授以自己的真情投身于戴山之学,体贴出其学以“证人”(立人极)为宗旨,从心性论上证明人心之本善,在人心中凸显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本质(性体),从工夫论上强调实修实证,以证成圣贤人格。戴山援理气以入心性、心理冥合为一,性天上一贯,而于心性论特重显豁性体的客观超越义,在工夫论上亦强调心体的收摄保任、静定凝敛,其学术性格超越朱子和阳明,振纲的这个体贴甚合戴山之学的基本精神。

和合的历史观是把历史的客体与历史的主体看成是既冲突,

又融合,融突而和合的形态。历史是历史客体演化而生生的过程,历史又是历史主体参与实践而凝聚的生命活动指向。历史主体受历史客体时空的制约,历史客体的实践又受历史主体价值观念的指导,因为历史客体的实践活动是历史主体观念指导下的活动,没有脱离或无历史主体观念指导下的活动,否则就是历史僵尸的活动,没有灵魂的活动。历史作为有生命的活动,这个生命是历史主体人赋予的,而不是天命赋予的。历史的“转生”或历史文化(传统文化)的“转生”,是历史客体与历史主体冲突融合而和合的“转生”。

在现代意义上的转生,是指传统文化与现代主体人的冲突融合而和合的“转生”。譬如戴山证人之学的内在义理架构展开为理气生生以立极,以心著性以显极,即体即用以证极,化念归心以复极。李振纲教授说,此四句,刘宗周并没有这样定名,是他反复推体先贤之心,参证理学通义,内省自家心境而得出的概括。这种概括是令人敞开胸怀,与先贤自由、平等对话和交融而获得身心的体验,是与戴山证人之学内在理路相契合的,亦是对戴山证人之学的现代诠释。这种现代诠释,既是对戴山文本的字面意义和隐蔽意义的理解和体认,亦是对文本这两方面意义所呈现的基本精神的“转生”的体会。文化精神的“转生”是多元文化(古今、中西等)的“融突和合”,从而转生为一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也许是可以从戴山之学这种精神文化的“转生”中获得的。

本书是振纲教授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增订而成的。他圆融古今,会通中西,体识精到,新见迭出。本书从朱学式微、王学异变的晚明之季,戴山身居庙堂,则建言王道,退守乡野,则修明圣学,以挽救世道人心为担当的论学背景契入,而展开其心路历程、精神特质、逻辑结构的诠释;从心体与性体的圆融互证,融气质于义理,以道心定人心,心意知物的连体贯通,而展现戴山以心著性,使主

体之心得到贞定,使形上之性得到落实;从本体与工夫、慎独与诚意、静存与动察的体用不二,而达理气合一,道器合一,道心人心合一,理性气质合一;性情合一,未发已发合一,最后通达心性圆融圣人之境。在本书中,其进路、其展现、其会通、其逻辑、其结构,均与现行的同类著作异,其诠释、其体认、其理解、其领悟,亦有其独到精妙之处。

振纲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有缘作他的导师,今其博士论文即将付梓,我乐观其成,喜为之序。

2000年11月25日于

中国人民大学静园静思斋

世纪之交，我们站在时代的入口，亟待着文化价值系统的重构，并深感任重道远；而重新阐释和挖掘中国传统哲学的意义世界，促使其精神的现代转生，是现代性文化价值体系确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中国哲学青年学术文库》正有志于这一文化精神的担当，精心筛选了一批在中国哲学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优秀著作。在这里，聚集着一批活跃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领域的青年学人，他们贵于创新，展现和昭示着未来。我们希冀本文库的出版，有助于他们对中国传统哲学做出新的开掘，从中发现一片新的精神世界；我们也诚邀更多的博士俊杰加入到我们的文库行列，祈盼庶几能推出一批学术新人。

约稿编辑 方国根
责任编辑 张振明
封面设计 曹 春
版式设计 赵营珂

目



录



1	序	张立文
1	第一章 戴山之学的论学背景	
2	一、明中叶心学崛起的历史文化前提	
6	二、王阳明道学革新及其二重性	
14	三、心学的异变与性体的重建	
20	第二章 戴山之学的总体特征	
21	一、学“凡三变”而圆通	
30	二、归显于密的精神特质	
39	三、内在理路与逻辑结构	
49	第三章 道德理性本体的重建	
50	一、心体与性体的圆融互证	
62	二、融气质于义理,以道心定人心	
72	三、存发一机、中和一性说	
86	四、心、意、知、物的连体贯通	
100	第四章 “证人”工夫论	
100	一、本体与工夫	

112	二、慎独与诚意
131	三、静存与动察非二事
138	四、《人谱》证人说
150	第五章 戴山哲学的定性与定位
150	一、哲学立场
156	二、理论定位
163	三、历史局限
169	四、精神转生
172	附论：晚明心学与士人心态三篇
172	一、王艮与一代狂儒泰州学派
194	二、李贽——16 世纪的“异端之尤”
222	三、晚明士人的“快乐”心态
244	参考文献书目
249	后记

第一章

蕺山之学的论学背景

刘宗周(公元 1578—1645 年),字起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人,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的蕺山,自称蕺山长,学者尊其为蕺山先生。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进士,在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居官,先后授行人司行人,礼部主事,光禄寺丞,尚宝少卿,右通政,顺天府尹,工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左都御史等职。因直节敢谏,三被罢官。李自成入京,明室南渡,刘宗周起复原官。浙江失守,他看到明王朝气数已尽,绝食而亡。刘宗周是一个典型的理学名臣。他与所有真正的理学家一样,其人格、心灵、命运与其信奉的哲学理念(道)是内在一致的。蕺山一生,尚忠直,严操守,重气节,“从严毅清苦中发为光风霁月”(《子刘子行状》,《刘子全书》卷三十九,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及《全书》卷次)。居官“通籍四十五年,在仕仅六年有半,实立朝者四年”(《年谱下》,《全书》卷四十)。这种一身清操、不畏权势、不恋富贵、赤心向道的精神操守,正是他所讲求的慎独之学(证人之境)的人格写照。在儒家传统中,自古便有“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出处进退之道。蕺山身居庙堂,则建言王道,以置君尧舜为己任;退守乡野,则修明圣学,以挽救世道人心为担当,正体现了忧乐天下的儒家士子

情怀。戴山生当朱学式微,王学异变的晚明之季,力挽狂澜,只身担当,以重建心性本体,复兴孔孟道统为职志,其学行堪称世范,明末公推为海内硕儒。古人云,知人论世。戴山哲学是对明中后期兴起的心学思潮的理论总结与矫正。因此,要契入戴山哲学的内在精神,就必须对明中后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心学思潮的演化做出历史追溯和逻辑还原。

一、明中叶心学崛起的历史文化前提

明代中叶,即通常所说的弘治、正德之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逐渐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孕育产生,引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解体。诚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引《歙县风土论》云:“国家厚泽深仁,重熙累洽,至于弘治盖綦隆矣。于是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女子纺绩,男子桑蓬,臧获伏劳,比邻敦睦,……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货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其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这些描述,所反映的问题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小农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二是城镇商业经济趋于繁荣。稍后,不但江南沿海地区牧歌式的封建田园生活不断为商品经济所打破,就是在内地,商品经济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据谢肇淛《五杂俎》卷四记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则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又据《明实录》神宗卷三六一记载:当时苏州纺织业已极发达:“染房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这些材料不仅说明了苏州纺织业发达的程度,而且说明了织工、染工的

性质。他们已不是封建行会中的帮工和学徒,而是数千人集中在一起随时都可能被“罢”掉的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此外,由于明代统治者奢侈的生活和大量军费开支,致使国库金银匮乏;为摆脱困境,朝廷大力提倡开矿、淘金,这又刺激了明中后期矿业的发展。由于商业、手工业、矿业的发展,使具有近代特征的城镇逐步形成,市民阶层日益扩大。这种新社会因素,以“恶”的形式瓦解着封建社会母体和宗法伦理秩序,成为自发产生与传统伦理相冲突的新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的历史前提。

其次,受现实生活中新经济因素的刺激,民风士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且看苏州震泽镇风俗之变化:在明初,“风尚淳朴,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侈。若小民咸以茅为屋,裾布荆钗而已。即中产之家,前房必土墙茅盖,后房始用砖瓦,恐官府见之以为殷富也。”正德、嘉靖间,世风渐趋腐靡,万历之后,“贫民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震泽县志》卷二五)。切近市民社会的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态度、思想道德、价值取向的变化更甚。我们随便翻一翻谢肇淛的《五杂俎》、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及稍后张岱的《陶庵梦忆》、袁宏道《袁中郎随笔》等,就不难看出,当时的士大夫不再安于昔日的斯文雅趣,而甘愿醉卧于风月场中;不再安于箪食瓢饮的孔颜之乐,而一味追求放情恣欲的感官快乐;不再怀幽兰孤芳之操,而宁与达官巨贾合欢于官场市井。一句话,他们不再以忧乐天下为己任,而一味沉溺于讲美食、嗜茶酒、建园林、赏花草、蓄声伎、听评话、读闲书、喜交游等世俗之乐。人心流于佚荡、生活失之放纵,成为明中叶后士人生活的基本征象。标榜“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儒家名教和“存理灭欲”、主静持敬的程朱教条再收束不住日趋世俗化的士子骚动的心灵。

再次,潜滋暗长的农民起义与武宗一朝的朝纲荒乱,标志着朱明政权统治危机正在来临。翻开《明史》,弘治十八年五月,明皇统

中为数不多的开明皇帝朱祐樞去世。骄纵的武宗朱厚照继位。他日事游戏,不理朝政,奸宦刘瑾乘机擅权,一批志愿“锐复三代”的正直朝臣饱受荼毒。刘瑾专权开尔后严嵩迫害忠直、魏忠贤结党营私之先河。正德五年,刘瑾伏诛,然而朝风士气元气大伤。不久,刘六、刘七农民义军蜂起,江西、四川等地饥民暴动踵至,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正德七年,局势稍稳,武宗又调边军入禁中,晨夕驰逐为乐,朝政松弛不堪。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谋反于南昌,几乎酿成第二次“靖难之变”。总之,武宗一朝,国事败坏至极。自此,明朝统治开始步步滑坡,成为晚明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起点。

至此,如何回应市民社会和切近市民社会的士大夫对主体自由精神的追求,如何化解晚期封建社会潜滋暗长的社会矛盾,挽救明王朝世运潜移的政治危机,成为明中叶社会现实向当时理学提出的内在要求和时代主题。应该指出,从王阳明到刘宗周的心学思潮正是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展开和深化其心学内涵的。

从思想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长期居于官学地位的正统理学已无力挽救上述危机。从南宋末至元代,程朱理学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当时虽有陆象山独唱“心学”,与之竞争“道统”中的正宗地位,然而终未能取而代之。这一方面是由于程朱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理学经朱子精心构造之后,“致广大而尽精微”,其体系之完备,内容之丰富,使陆氏兄弟无法攻破其壁垒。更主要的原因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在刚刚建立时及其后一定时期内,其自身弱点还未显露出来。因此,直到明初,程朱理学还统治着思想界,且得到强化。明初统治者标榜“理学开国”。永乐时,敕撰《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科场选士均以朱注为准,一时学者皆宗朱子学。《明史·儒林传》云:“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先

儒之正传,无敢改错。”从明初至成化百余年间,程朱理学作为官学几乎垄断了当时的思想学术。然而,一个学派,一旦失去了与之争鸣的对立面,它便会陷入僵化与虚伪;同理,一个形上学的体系越是完备封闭,就越会成为后学的束缚和包袱。

朱子学庞大的理论体系内在地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弱点:一是把“理”绝对化。“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答黄道夫》,《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理”作为“形而上之道”是万物“所以然”之故,又是人伦“所当然”之则,在朱子学中占据着绝对至上的地位。尽管朱子讲“性即理”,然而在他的学说中,“理”终究是超越有限之上的绝对实体,是天地万物必须遵循的准则(太极)。这就是说,理学本身就包含有压抑个性,以绝对精神(天理)宰制主体精神(人心)的倾向。二是向外穷理的致知论。朱子强调即物穷理、居敬明理,讲“泛观博览”、读书明理,讲致知与涵养并重、知与行相须等,虽然比陆九渊发明本心的“易简”工夫较为合理,但他物格于彼,知尽于此,穷理于外,诚意于内的致思方法,却包含着尔后王阳明一再批评的“析心与理为二”,“析知与行为二”的支离决裂的毛病,易使学者偏执于“穷理”一途,单在学问思辨上用功,陷入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相脱节的教条主义。三是“学问须严密理会,铢分毫析”(《朱子语类》卷八)的学究气、书卷气。朱子为人近伊川而不似明道,他一生治学严谨,精于名理,长于经解注疏,而缺少象山的狂者胸次和阳明子的真性情。他将毕生精力投注于经义传疏,在形上形下、理气先后、道器本末、体用动静、理一分殊、未发已发、致知涵养、穷理践实、心统性情、道心人心、天理人欲等问题上极尽慎思明辨之能事。他所建构的思辨体系对于少数有学问兴趣的人和那些热心科考的士子来说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而对大众层面的人和那些具有独特生命体验的人并不亲切。

上述弱点,是朱子学本身固有的。不过朱子在世时尚未充分显露出来。因为朱子本人是知识渊博、学有功底、学养兼备且具有创造性的大贤,理学经他之口说出,并不觉得乏味,并不觉得抽象,并不使人感到虚伪。即使一度官方宣布道学为“伪学”而大加压制摧残,朱子本人和朱门真心弟子也未对道学丧失信心。然而,朱子去世二百余年后,殆至明代中叶,情况就大为不同了。一是如上所述,社会历史条件,民风士习,时代精神已不同于宋元,朱子学的绝对伦理主义已收束不住中晚明市民意识的骚动。在市民社会冲击下,它正在丧失昔日的至上性与合理性。二是二百余年的官学地位,形式上扩大了朱子学的影响,而实际上却扼杀了朱子学和朱子学派的生命力。元、明之际,朱子之后虽有几个后劲,但论其大观,门户之见日深,墨守之习日固,越来越趋于僵化、封闭、保守和虚伪。理论与实际日益脱节的正统理学遂被阳明子讥为“口耳之学”。弘治间吴中文人文征明亦指责朱学之伪,“偷簿自画,假美言以护所不足;甘于面墙,而不自知其堕于庸劣焉尔”(《何氏语林序》,《明文海》卷二一二)。

二、王阳明道学革新及其二重性

明代中叶,一批具有自由精神和真性情的文人士子纷纷起来批评理学迂阔、陈腐、虚伪和不近人情。思想文化界遂形成两股批判反省、推陈出新的思潮:一是文学上的,即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文学复古思潮。他们在文学上批判平庸萎弱的台阁体和尊理抑情的理学滥调,主张复兴汉唐诗文情理交融的文学传统。名为复古,实则革新。二是学术上的,即王阳明发起的以“心学”改造正统理学,以心性主体论哲学改造朱子学以“形上”统摄“形下”、以“天理”宰制“人心”的绝对伦理主义的道学革新运动。